

高陶事件始末

陶恒生 著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数据)

高陶事件始末/陶恒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
2012.2

ISBN 978-7-5000-8749-6

I. ①高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抗日战争—历史事件—中国
IV. ①K265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7017 号

策 划 人 郭银星

责任编辑 陆 源

责任印制 杨海涛

封面设计 海马书装

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**邮政编码:** 100037

电 话 010-88390635

网 址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34.25

字 数 457 千字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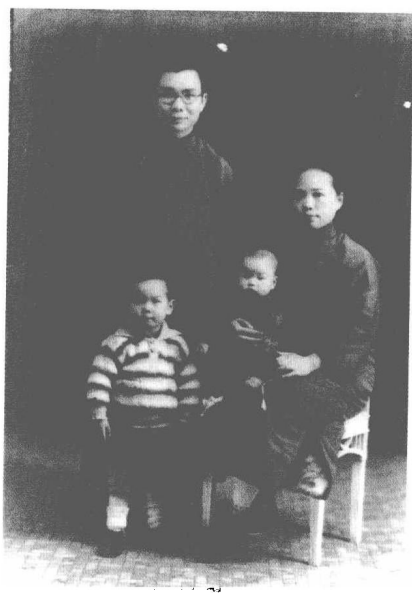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 ISBN 978-7-5000-8749-6

定 价 5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1932 年的北大教授陶希圣



陶希圣夫妇及恒生、晋生于北平
(193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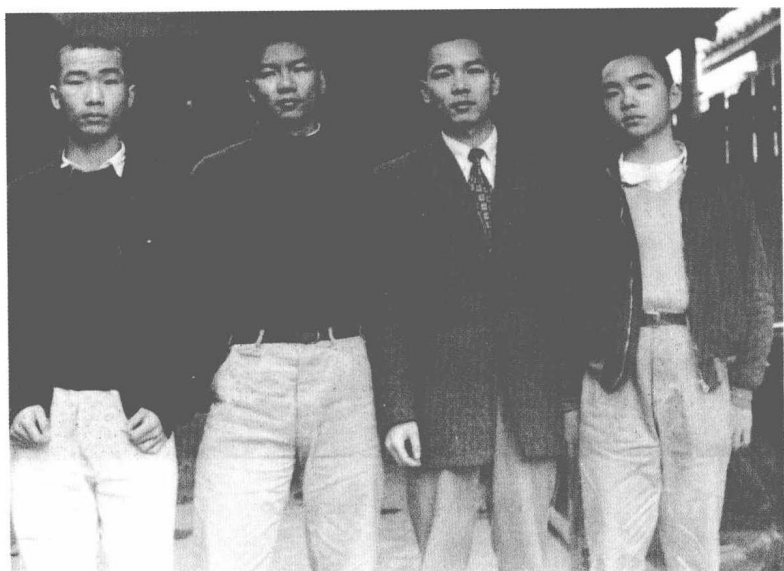
(左起)琴薰、晋生、恒生、母冰如、泰来(北平 1934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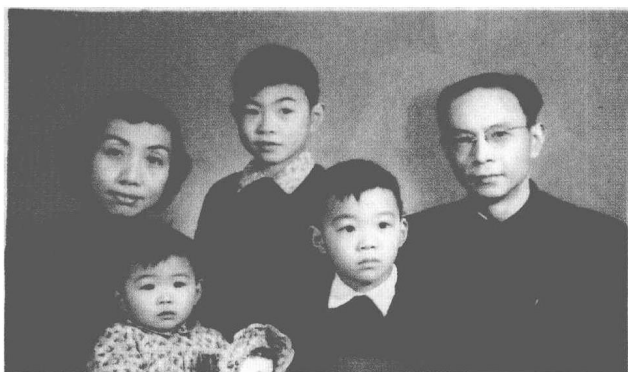
1937 年,陶希圣偕恒生(中)、晋生摄于北平故宫太和殿



陶琴薰于沙坪坝中央大学校园(重庆 1944)



学生时代的四兄弟(左起)范生、晋生、恒生、龙生(台北 1952)



沈苏儒、陶琴薰及儿女宁、熙、燕(北京 1958)



1966 年春节在台北合照



祖母与孙辈整理邮票(台北 1966)



陶希圣、万冰如夫妇七十岁合影(台北 1969)



龙生服预备军官役时与父母合影(台北 1969)



陶希圣与泰来、恒生摄于台北食货出版社(1986)



陶希圣与外孙儿女及曾孙合影于旧金山恒生寓所(1987)



陶希圣偕恒生夫妇于旧金山金门桥(1987)



陶述曾托沈苏儒带往旧金山为陶希圣九十寿辰写的百寿条幅(旧金山 1987)



沈宁、熙、燕送给外公一付祝寿条幅，曰：春秋卅余载，离合一亲情。啼儿高七尺，天涯叩九旬。开怀掺泪酒，掷觞话古今。绕膝盈几日，欣慰满生平。(旧金山 1987)



1987 年 10 月 5 日《中央日报》在台历任负责人祝贺陶希圣九十大寿

序一

何兹全

恒生师弟把他撰写的《高陶事件纪实——追忆六十年前先父随汪脱汪之前后》(即今《高陶事件始末》——编者注)扩编成书,嘱我写序。我很高兴写,也是我义不容辞的。

业师陶希圣先生一生生活在个国世界里,也可以说生活在两个天地里:一个是学术天地,一个是政治天地。在学术天地里,我是他的学生。他 1931 年到北京大学作教授,我是这年考上北大史学系的。他开“中国社会史”、“中国政治思想史”,我都选听。1934 年他创办《食货》半月刊,从“创刊号”起,我就在上面写文章。在政治天地里,我也跟他做过一段时间的事。抗战军兴,他受命主持“艺文研究会”(国民党的非官方组织),领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,我受聘为研究组组员。顺便说一句,艺文研究会的主管人确实是称作总务总干事和设计总干事,总务总干事是周佛海,设计总干事是陶希圣。我们的聘书(或任用书,记不十分清楚),都是他们两人共同签名,上面带着头衔。自汉口艺文研究会成立起,到重庆陶先生出走艺文研究会撤销,没有变动。这个记忆是确切无误的。但我只是艺文研究会的一个研究人员,所知所见只是具体小事。至于在大决策档次,有没有其它名称的提出和使用,如总干事副总干事之类,则非我所知了。陶涤亚先生所说(《传记文学》435 期),可能是不同时期的事。

我在艺文研究会拿工资，不到会办公，在家里编《政论》半月刊。《政论》原是由《教育短波》社主办的，后来才由艺文研究会出钱接办，始终由我编，没有易过手。我在《政论》上写的文章，武汉时期（1938 年上半年）在舆论界还是有些影响的。据说，国民党的上层看了都很高兴。陶先生自然也很高兴。我这时的政治思想，对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看法，都和陶先生的思想有些距离。我主张民主，主张全民抗战甚至焦土抗战，没有低调思想。左派或共产党的刊物《群众》或《生活》送我一个头衔“新陶希圣主义”。新，就与不新有别，虽然仍是一家。

陶先生人自然是极聪明的。但知识分子的弱点在他身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。他爱面子、重感情、遇事犹豫不决。他在国民党内部的人事关系，我接触不到，所知甚少。在国民党里，我曾是改组派，即汪精卫、陈公博、顾孟余为首的派系。我从改组派的人那里听说过：1932 年初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时，曾考虑请陶先生作秘书长，后来这一职务被褚民谊占去了。改组派是 1928 年成立的，如果我听到的消息属实，陶先生可能也是改组派。陶先生和汪精卫的关系在 1928 年前后就建立起来了。揆诸 30 年代国内政治情况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和陶先生的思想情况，那时他靠近汪就比靠近蒋的可能性大。不过，我只是据理推想，没有根据。

陶先生一生中政治上最大的失策或错误，是跟随汪精卫出走。从我和陶先生的接触中，我理解这是陶先生一生最痛悔的事，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结。在思想上，未随汪出走之前，他已认识到跟着汪走下去，不是正路甚或已认识到是绝路。在他离开重庆到昆明、到香港后，我给他写信说：在重庆几百万大军的基础上才有和可谈，离开重庆就只有投降没有和谈。他接信后，很认为这是知心知己之言，马上回信说：

手书至为感动。弟现正在于悬挂空中之境遇。弟以为中国对敌战则全面战,和则全面和,至其主体则战由国府战,和与国府和。…此皆在国内时,曾为当轴深言之者也。迄今仍坚持不变,以至自处于十二万分之苦境,今已在离去之前夕矣。

这也是他去上海之前的思想,思想上已极端痛苦,很想离开汪了。但他仍是去了上海。无他,重情面、重感情;一拉,强拉,就磨不开面子又跟着走了。最后,日本人拿出“密约”,要汪等签字,他才清醒了,知道到了主和和投降的分界线了,才断然割断感情,破除情面,携“汪日密约”,冒生命危险,回到香港,最后又回到重庆。

签定密约或揭露密约,这是投敌与主和的分界线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“弟出生入死以求主和与投敌之界限,至今始为主和者吐气矣。”(1940年1月27日回香港后给我的信)陶先生这话,是自慰也是实情。悬崖勒马,回头是岸,这和走下去是不同的两种境地:一是投敌,一是主和。陶先生主和,未投敌。这是大节。严重错误,未失大节。

说明这一点,对评定陶先生一生政治生命是极重要的。国民党内外和社会上常有一部分人总是把他向投敌、失节方面推,而他本人也常受这种心理压力。在重庆时,我曾劝他到一个大学作教授、作学问,回到学术上来。他摇摇头说:“离开这个门(蒋介石侍从室),人人会骂我,打我,指着 my 背后说:‘莽大夫!’(指扬雄,曾作王莽大夫)。我在这里,背后可以骂我,当面却要奉承我,笑脸和我说话。”他说“莽大夫”,心里是沉痛的。我说,他主和,但未投敌,更未作汉奸,是实事求是的评价。我们应该还历史以真实,还陶先生以公道。

有一个问题,常常被问起:陶先生去上海是不是“卧底”?恒生说:“卧底的说法让认识先父的友人,甚至敌人难以置信。”香港沦陷日本之手后,陶先生逃回重庆。有一次,我曾问他:“外人传说汪和蒋介石唱双簧,是真是假?”他说:“不是。好比喝毒酒。我喝了一口,发现是毒药,死了一半,不喝了。汪发现是毒药,索性喝下去。”他告诉我的话,以喝毒药为喻,我想是真实的。卧底不会是事实。恒生的书引用1986年台湾《国防部史政编译局》第十次访问,对于揭发“汪日密约”的动机,陶先生说:“我曾两度写信给胡适,我所处的地位是:我不是间谍,也不是做情报,但既发现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,我怎能不说。”以此证明陶先生“卧底”之说是不能成立的。陶先生那年已经88岁了。

知识分子自古悲剧多,近世尤多。陶先生一生也是一场悲剧,一个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悲剧。

这是政治天地里的陶希圣。陶希圣还有一个学术天地。对他在史学方面的造诣、贡献,和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地位,作出论述、评价,我看是更重要的一面。他到台湾后,很有些年轻的学者在学术上和他接近。如今他们都是大史学家、文章高手。我希望他们能对陶先生的史学作出评价。自然,我也是责无旁贷的。年岁大一点的,陶先生早年的“亲兵”、“爱徒”,恐怕我已是仅存的一个了。我正在酝酿写这样一篇文章。

何兹全

1998年8月9日

序 二

唐德刚

八年抗战这一可歌可泣，从彻底溃败到全盘胜利的惨烈战争，实为我五千年中华民族史所未尝有。而在这一战争最惨烈阶段，抗敌全师丧亡殆尽，精华国土，泰半沦陷，亡国灭种的最危险关头，我们全族第一号元老，全军的第一副统帅，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，经过长期与敌国暗相勾结，忽然背叛祖国，投向敌人，并主动组织伪军伪府，与祖国对抗。汪氏这一当国叛国的行为，细查五千年国史，显然也是绝无仅有的一宗。可是想不到，汪氏叛国经年，在卖身投敌的最高潮期，与敌寇正在秘密签署卖国卖身条约的前夕，他的贴身亲信高宗武、陶希圣二人，不齿于汪氏的卖国行为，竟不约而同地冒全家伏诛之巨险，秘密逃往香港，将汪日密约公布，使举世为之哗然，合族为之切齿。盖汪氏此一卖国卖身之规模（如承认伪满独立，日寇在中国驻兵设防等等），亦史无前例。虽石敬瑭、张邦昌、秦桧之流，亦不愿为之也。

就在汪伪叛国的高潮期，笔者却正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肄业。以一史学学徒，目击此一现代叛国史演进的实况，虽曾紧跟着追踪不舍，但是对汪氏之为何叛国，如何叛国，以及高陶之何以附逆于前，叛逆于后，却始终不得其解。师友之间，也